

“共富联合体”：共同富裕视域下村级集体经济的 重建与形塑——基于嘉兴市的实践研究¹

朱莹莹

(中共嘉兴市委党校, 浙江嘉兴 314001)

【摘要】：以共同富裕为导向, 加快创新发展村级集体经济, 既是破解财政扶持背景下村集体“地租经济”发展困境的现实需求, 也是进一步激活乡村资源、创新平台载体、加快利益联结进而发展农村事业、增进农民福祉的关键所在。共同富裕示范区建设过程中, 嘉兴等地深入开展了以村级集体经济为核心的强村富民改革, 创新推出了以共富工坊、共富大棚、共富菜园、共富码头等为代表的共富产业项目, 打造了资源盘活、服务提升、众筹共建、抱团发展型的“共富联合体”, 从创新要素发掘新空间、细化富民增收颗粒度、激发资源要素联立效应等方面, 形塑了村级集体经济创新发展的路径模式与演化机制。

【关键词】：共同富裕; 村级集体经济; 联合体

【中图分类号】：F127.55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1-3079(2023)06-0011-06

村级集体经济不仅是乡村振兴战略, 也是共同富裕和现代化建设的微观实践主体。党的二十大报告指出, 要“发展新型农村集体经济”。运行高效有序的集体经济, 可以有力保障村级社会福利和公共服务, 满足农民对美好生活的需要, 更好地发挥“统分结合双层经营体制”中“统”的功能: 一方面, 通过强化村域范围内资源要素的开发利用, 进一步培植乡村治理创新、村民价值认同的社会土壤; 另一方面, 发挥其经济发展和政治保障的双重功能, 进一步强化其城乡资源、工农资源以及各级政策资源交汇的载体优势, 持续打开乡村价值发掘和要素配置优化的新空间。

近年来, 各级政府不断加大对村级集体经济扶持力度, 极大缓解了乡村发展资源匮乏、资本缺失的困境。寻求村级集体经济永续发展的内生动力和治理模式, 仍然是新阶段深入推进乡村振兴的重大任务。共同富裕重大战略部署实施以来, 在国家层面行动纲要及统一指标体系、改革方案、考核办法出台之前, 不同行政区域和社会主体也自觉地以共同富裕为目标进行自身的改造。从乡村角度而言, 关键是如何创新村级集体经济模式, 加快构建共同富裕的“在地化”载体和基本单元。浙江作为共同富裕示范区, 从2021年起, 各地以集体经济为核心, 以共富产业发展项目为载体, 创新强化与企业、合作社、农户、社会组织等利益联结机制, 形成了大量乡村“共富联合体”, 并逐渐演变为村级集体经济发展的主流形态。研究村级集体经济在乡村“共富联合体”的角色构成与行动逻辑, 无论是从探索破解新时代乡村发展矛盾的有效途径来看, 还是从共同富裕由局部向整体拓展的视角来看, 都具有十分重要的理论和现实意义。

一、村级集体经济的发展困境：“地租经济”遭逢“增长的极限”

(一) 财政扶持背景下村集体“地租经济”发展

从经营方式和实现形式而言, 改革开放以来, 村级集体经济转换路径实现了从竞争性的、直接经营的“产业经济”转为非

¹ 收稿日期: 2023-07-16

基金项目: 浙江省哲学社会科学规划课题 (21NDJC327YBM)

作者简介: 朱莹莹 (1984—), 女, 河南新乡人, 中共嘉兴市委党校副教授, 研究方向为区域经济。

网络首发时间: 2023-10-26 16:48:46 网络首发网址: <https://link.cnki.net/urlid/33.1273.Z.20231026.1519.004>

竞争性的、村社集体不参与直接经营的“地租经济”[1]。然而，因其兼具提升经济效益和公共建设保障功能的特殊性，近几年，村级集体经济普遍采用项目制的方式，即运用财政资金建立集体经济发展项目库：有的支持村庄从本地或异地获得经营性资产，如建大棚、厂房、楼宇等；有的通过财政补贴引导村庄投入有稳定收益的半公益经营性项目，如光伏扶贫；有的支持村庄承接小型政府项目，政府把部分对资金、技术要求不高的项目委托给特定村集体实施，如绿化保洁、河道清理等。整体而言，大多数村级集体经济收入增长是外生性的，这类财政或亚财政公益项目旨在保障收入和现金流稳定，以规避直接市场化经营的高风险问题，但本质上相关收入仍是由财政资金转化而来的利润、租金和利益等，尽管在“消薄清零”政绩导向下，短期可快速增加账面收入，却未能从根本上激发集体经济的发展活力和市场生存能力。

(二)外生性扶持主导下的增长困境

直观来看，村级集体经济经历 10 余年的高速增长，已陆续陷入经常性收入增长放缓 1、经营性收入占比较低、补助性收入依赖过高等发展困境。以浙江省嘉兴市为例，作为统筹城乡改革先行地和共同富裕典范城市，2022 年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统计公报数据显示，该市农村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达 46 276 元，连续 19 年居全省第一；城乡居民收入比缩小到 1.56：1，保持全省最低。2009 年以来，针对薄弱村发展条件差、投资效益低、项目质量不高等问题，嘉兴连续出台四轮“强村富民”计划，村级集体经济总收入、经营性收入均居全省第二，所有行政村两项收入分别在 150 万元、50 万元以上，形成了以“飞地抱团”等为代表的强村富民经验模式。然而，2020 年新冠疫情后，受宏观经济下行、财政投入增长放缓、运营模式单一等因素影响，该市村级集体经济发展也遭遇到了明显的增长瓶颈问题。

1. 补助性收入占比过高，持续“造血”压力较大。

从统计公报来看，尽管 2022 年嘉兴所有村经常性收入都超过 150 万元且经营性收入超过 50 万元，发展相对均衡。但从收入结构来看，村集体自身“造血”功能不强。市农业农村局资料显示，村级集体经营性收入只占 38.6%，低于全省 60% 的平均水平，而补助性收入占比超过 50%。个别村收入仅来自于物业经济，除“飞地抱团”项目外别无其他收入。特别是到了 2021 年后，部分村集体经济物业收入并不与承租企业直接结算，而是由乡镇政府财政统一兜底，已然成为一种“财政补贴物业经济”。

2. 后续营利增收乏力，缺乏市场韧性和抗风险能力。

村级集体经济经营性收入增速开始落后于总收入增速，物业经营项目普遍存在收入渠道、结构单一的发展隐忧。一方面，受宏观形势影响，新增“两创”中心项目多处于投运起始状态，民间投资乏力，厂房、楼宇等经营性资产闲置压力较大。另一方面，受农村建设用地收紧以及“非粮化”“非农化”“能源双控”“退散进集”等政策性因素影响，村级集体经济创新发展也面临日益严峻的空间要素制约问题，后续增收乏力、压力较大。

3. 乡村运营成本偏高，村集体支出压力较大。

自 2012 年以来，美丽乡村、景区村庄已在全省扩面建设，仅嘉兴市景区村庄数量已超过 500 个。调研获知，嘉兴下辖的海盐县等地的景区村庄原住民普遍在 60~70 户，所在行政村多轮撤并后普遍在 500~700 户，即景区村庄高标准的配套不能为所属行政村多数村民享有，但运营费用要共同承担。据了解，3A 级景区村庄一般为自然村，村均累计投入可达数千万元。即使不举办特色活动，每年只做卫生保洁、绿化养护等村庄日常运营保底费用就要 50 万元，运营好的甚至逾 100 万元，而相关费用都要从村集体列支，这加大了村集体经济的财务压力。

4. “美丽经济”变现能力弱，“宜居不宜业”问题突出。

近年来，一批快速腾飞的网红村、明星村、特色村的红利潮水逐渐退去。据嘉兴市文化广电旅游局统计，2020 年嘉兴全市

乡村旅游接待游客人次爆跌 33.7%,尽管 2021 至 2022 年有部分回升,但仍未达到 2019 年峰值水平。部分村庄业态单一、缺乏特色、经营不善,未能及时调整产业结构和用心打造品牌,有些村庄甚至一味加大投入、债务高企,导致乡村产业链条短、引流能力有限、土特产商品化率低,“宜居不宜业”等问题开始凸显。

5.分红比例较低,村民获得感不足。

据嘉兴市农业农村局统计,尽管经过多年努力,2022 年全市实现股份分红的村集体经济合作社占比已超过 40%,但总的分红金额社均仅 55.03 万元,而且各地股份分红情况极不均衡,高的可达 88%,低的只有 4%,大部分在 20%多一点。部分村因基础薄弱,对实施股份分红思想上有顾虑、股份分红机制尚不完善。

总体而言,直接或者间接的外生性扶持依赖,造成了村级集体经济的结构性发展困境。当然,村级集体经济异于其他市场主体,要充分利用好经营收入和补助收入两个方面,既得把握各类外生资源注入带来的发展契机,更要致力于探索培养村集体内生增长动力的新路径,突破“有增长、无发展”的转移性收入依赖困境。[2]在共同富裕语境下,意味着要加快构建“先富带后富、先富帮后富”的制度体系和发展模式,加快村级集体经济从“外源型”向“内源型”、从“单一型”向“复合型”、从“增长型”向“共富型”的迭代升级,全面打造活力迸发、多元复合、治理有效的新型村级集体经济。

二、走向“共富联合体”:村级集体经济创新发展的新趋向与主要模式

嘉兴作为全省唯一的强村富民乡村集成改革综合试点,自 2022 年开始,聚焦持续增强村集体“造血”功能,深入开展了以集体经济为核心的强村富民改革,通过拓展合作范围、盘活要素资源、提高组织程度、降低交易费用、强化利益联结,持续创新打造一批共富工坊、共富大棚、共富菜园、共富畜(禽)园、共富码头等共富产业发展项目,让更多涉农资源“统”起来、“聚”起来,让促富资源“嵌”进去、“融”进来,建立更加稳定的利益联结机制,以“共富联合体”的形式开辟群体增收、主体增效、集体增富的新路径。据统计,截至 2022 年底,全市累计建成共富抱团项目 146 个,累计培育强村公司 77 家,村均年经常性收入 362.7 万元,村均年经营性收入 249.4 万元,对消除薄弱村、壮大村集体经济、促进富民增收起到了很大作用,有力助推了共同富裕示范区建设。

(一)资源盘活,共建共富产业发展项目

1. “二次创业型”:共富工坊。

海盐县等地聚焦部分村集体经营性建设用地,加快物业资产盘活改造,针对“空院子、破房子、无组织、无人员、无收入”的现象,通过功能提升、原地改建等形式,将旧仓库、旧厂房、旧茧站逐步盘活为“康养乐园”或“电商直播间”共富工坊,并积极对接上级政府争取政策资金支持,引入专业队伍运营,以“二次创业”拓展村集体经济发展新空间。

2. “代管运营型”:“新乡邻”共富体。

平湖市新埭镇等地创新性地推出了“新乡邻·共享厨房”“新乡邻公寓”模式,引导村民将闲置农房、小院租给村集体统一改造、统一运营,将改造后的乡村人才公寓租给周边园区企业,将改造后的小院“共享厨房”打造成游客就餐、休憩、农事体验的创意场所,并进一步推出“共享厨师”“共享菜园”“共享菜单”等一系列“共享”衍生品,充分盘活村民的沉睡资产,打开村集体增收新空间。

3. “帮扶组织型”:共富菜园。

海宁市袁花镇等地村集体结合美丽乡村建设,与供销社、农技站等农合联单位加强合作,引导农民清除堆放的杂物、盘活

房前屋后闲置用地，组织农民种植整洁美观的共富菜园。由村集体负责动员组织、统筹协调；供销社负责确定蔬菜品种，免费发放种子种苗，成熟后统一收购销售；农技站、专业合作社等负责提供技术培训和指导，进一步破解散户种植“缺规模、缺组织、缺技术、缺资金、缺销路”的问题和美丽乡村“动员难、维护难”的问题，有力助力农民增收和美丽乡村建设。

(二)服务提升，加快资源整合提升效益

1. “退散进集型”：共富大棚。

嘉善县姚庄镇等地结合全域土地综合整治，以农田集中、农业集成、农户集聚“三集”为抓手，大力开展“以棚换棚”行动，由村集体引导农户将“低小散”的种植大棚流转至镇(街道)、村(社区),通过统一规划、统一建设、统一管理，打造了一批设施齐全的高规格大棚和“双创”现代化农业小微产业园，农户再以土地流转金租赁新型大棚。一方面，解决了“插花地”困境，确保区域农业发展科学规划、统一布局，让原本散乱的乡村面貌焕然一新，进一步改善人居环境；另一方面，因材料使用标准高、设施配套齐全、农技服务完善，农户进驻后产量比以前增加20%以上，管理成本却比以前更低了，进一步促进了农民增收致富。

2. “数字赋能型”：数字大脑。

发挥村级集体经济数字乡村建设主力军作用，打造涵盖乡村规划、产业、环境、服务、治理等领域的“一张图驾驶舱”，拓宽互联网、区块链、人工智能等在农业生产过程中的运用，推广“种粮宝”“抱团富”等应用场景，实现生产过程精准管控、产品质量全程可溯、产销对接精准高效。结合乡村大脑、浙农优品、浙农田、浙农服等数字应用，统筹推进农业生产、农技推广、品牌建设、农村金融等为农服务领域数字化改革，让线上服务与线下服务共同发力，为壮大村级集体经济提供充沛动能。

3. “产销合作型”：产业农合联。

按照“一业一联”工作目标，村集体联合从事同一产业的家庭农场、专业合作社、合作社联合社、企业、产业协会等主体，以乡村特色产业为依托，组建联合体，叠加专业服务资源、服务功能，聚合联结外部服务资源、服务功能。嘉兴市秀洲区洪合镇引导村集体与区供销社合作新建村级供销社，投资建成集农贸市场、农产品冷链中心、种子仓库、村综合服务中心于一体的乡村产业综合体，既推动了供销系统组织向村级延伸，又通过合作共赢助力乡村共同富裕。

(三)众筹共建，组建多元化市场主体

1. “资本注入型”：共富码头。

平湖市新埭镇等地号召村民众筹入股村集体经济项目，建设共富码头工程——通过“村集体出资+村民入股+低收入家庭入股垫资”的形式，将简陋的露天码头改造提升，投资额部分面向全村村民公开众筹，村民以户为单位向村里认购，每年保底收益率达10%,建成后出租给第三方运营，根据码头实际效益实行浮动分红。码头二期工程按照“政府主导、村社参与、社会众筹”的思路，组建运营公司，持续创新发展以“国资公司+强村强社公司+共富基金+全镇低收入群众众筹入股”形式的强村富民“众筹+”2.0版本。

2. “运营带动型”：共富乡旅。

海盐县实施“农文旅”融合助富工程，将6个景区村庄联合起来，村集体与县级乡旅公司深度合作，共同负责景区开发、项目运维，充分利用了村集体零散土地、房屋等闲置资源，通过自营开发、招商引资等举措，吸引了社会资本、旅游创客入驻

开发特色民宿、中草药康养等项目。开展落实“万户农家旅游致富计划”,引导村民以自办或入股方式参与餐饮、休闲、研学等消费业态项目的开发。发挥自身经营服务优势,主动承接政府购买服务,助力乡村“银龄经济”发展,精准帮扶农户增收致富。

3. “共建项目型”:共富冷链。

村集体与涉农服务主体联合开展冷库物流项目,有效提升城乡冷链物流水平。桐乡石门镇等地的村集体通过联合供销社、农机专业合作社,共同建设供销冷链物流项目。与当地相关农业主体签订助农协议,以低于市场价优先提供给农业主体使用,有力提升产地农产品仓储保鲜冷链能力,让产品损失率显著下降,商品化处理能力普遍增强,产品附加值大幅增加,助力农业增效、农民增收。

(四)抱团发展,组建共富促富联盟

1. “强弱抱团型”:共富党建联盟。

通过跨区域强村带弱村、书记带书记、村村抱团的方式,成立兴村(治社)名师牵头的党建联盟,由片区内优秀村书记或镇(街道)下派优秀干部担任片区联合党委书记,对涉及跨村社的集体经济合作项目,共同开展协商决策,增强村社信任度,打通合作发展堵点、难点,推动乡村组团式发展。

2. “功能聚合型”:共富特色组团。

借鉴桐乡乌村组团开发经验,迭代升级片区经营业态,创新打造诸如渔家、磨坊、米仓、桃园等农旅休闲主题的特色功能。加快村企合作、跨村联营,打破镇域、县域、市域行政边界,加快与农旅、文创、餐饮、研学、康养等机构的联合,以产业农合联、农业合作联社、区域农产品品牌为功能链接主体,引导村社实现差异化、特色化发展,形成稳定利益共同体。

3. “空间置换型”:飞地、飞社助富。

打造多元跨区域合作新模式,将“飞地”建设与帮促结对地区消除经济薄弱村、带动群众增收有机结合起来,导入“飞地+飞园”“飞地+飞柜”“飞地+飞社”等多元协同助力共富新模式,联合开发科创项目、建立人才共引机制,帮扶结对地区破解技术、人才等瓶颈制约,不断壮大村集体经济规模,达到富民增收的目的。

三、形塑逻辑:“共富联合体”构建中的村级集体经济运行机制创新

在“共富联合体”打造过程中,村级集体经济体现了与共同富裕的天然内在逻辑关联。无论是政府政策等外部资源的积极嵌入,还是以党组织作为内在驱动力进行内外要素的整合,或者以多元复兴产业实施的乡村发展基础重构等,都在致力于协调利用市场机制和政府机制,形成一种“有效兼容的市场机制”[3],持续打开城乡资源要素自由流动与优化配置的空间通道,形成个性与群体相统一、发展与共享并重的共富导向利益格局。

(一)创新要素发掘新空间

1.加快劳动力余值开发。

在打造“共富联合体”的过程中,针对有劳动能力的低收入农户,村集体加快了“政、企、村、社”结对帮扶的进度,广泛动员超市、农贸市场、配送公司、爱心组织等精准对接农村剩余劳动力,重点引导老年农民、残障家庭、低收入家庭等进行再就业,提振农户自力更生脱贫致富的信心。

2.加快土地残值开发。

以村集体用地打造共富菜园、共富果园等形式，或村集体出资盘活农户闲置用地，以资本注入、组织创新、二次创业、空间置换等方式加快低效用地、零星用地的盘活利用，以规模化、标准化、特色化经营壮大村级集体经济，实现农户增收、兜底保障。

3.加快农房残值开发。

进一步激活农民存量用房、村集体低效用房，引导其向创新创业平台转型，由村集体聚力打造一批农业科创中心、青创园区、星创天地和孵化基地等高能级农业发展平台，加快乡村创新创业资源的链接与交互。

(二)细化富民增收颗粒度

1.创新设置“共富岗”。

通过“村集体+农民”“村集体+企业+农民”“村集体+社会组织”等多种类型的“共富联合体”，特别是就地、就近建设投资规模适度、见效快、风险低的共富产业发展和服务项目，创新设立“共富工位”“共富车间”等公益岗位，采用固定用工和灵活就业方式相结合，对低收入人群和就业困难人群优先匹配，构建一岗带多户、一户多增收的“致富共同体”。

2.灵活设置“共富股”。

动员多方力量，在村集体经济发展项目中增设“帮扶认购股”“帮扶提留股”“低收入家庭增收股”等，积极动员乡贤、党员、企业家、志愿者等各方力量认购帮扶股，在保持股权不变的前提下，创新增加低收入农户的收益空间和收益渠道。

3.形成共富“帮扶链”。

积极发挥村集体公共资源配置能动主体作用，立足涉农产业帮扶服务，持续做深“红贷”“红育”“红巢”“红创”党群创业共富工程，积极动员供销社、合作社、农超、物流公司等市场销售力量，创新利用直播带货、农博会、丰收节等平台帮助销售增收，汇聚共同富裕帮扶力量，形成完整帮扶链条。

(三)激发资源要素联立效应

1.构建多元人力参与格局。

发挥村集体经济合作传统优势，通过聘请志愿顾问、投资兴业、包村包项目等方式，创新引入农艺师、园艺师、职业经理人、经纪人、文化工匠、非遗传承人等专业型人才，统筹招募企业家、党政干部、专家学者、规划建筑师、教师律师、党员志愿者等互补型通用人才，构建广泛的社会动员及网络化参与的多元人力参与格局。

2.加快为农服务资源聚合。

通过产业化联合共富体，集聚生产、供销、信用、环境等多个领域的服务管理，采用市场化激励运行机制，有效嫁接乡村土地、劳动力、资金与外部科技、人才、资本等资源要素，从产前、产中、产后全过程为农民提供“一站式”保障、“一条龙”服务，解决分散农户“办不了、办不好、办起来不划算”的问题，使村级集体经济成为现代农业发展重要组织载体，打开小农

户对接大市场的空间。[4]

3.构建混合所有制经济发展新模式。

通过大力发展集体产权、社会资本、国有企业、政府与社会组织相联合的混合型集体经济，积极探索创新“集体+农户”“集体+社会资本”众筹模式，推动“集体+国企”“集体+农合联”“集体+工商联”等多元主体参与，进一步促进公共资源下放方式变革，发挥财政补助、专项资金的“母基金”作用，鼓励社员按比例进行实物或现金配股、组建多种合作社，走股权多样化、运营方式新、市场化程度高的包容性发展道路。

(四)积极拓展集体经济治理内涵

“共富联合体”一定程度上可以有效破解集体经济“分得充分、统得不够”的问题。[5]针对乡村转型发展过程中出现的参与意识淡薄、利己行动取向、现代规则缺位等问题，创新发挥村级集体经济在农业发展、农村建设中“统”的功能，通过实施“股份分红+积分奖励”模式组织农民自上而下对接资源，整治人居环境、建设美丽乡村等，开展差别化正反双向考核，推动农民现代品格形塑，实现人力资本与社会资本的嵌合、自有资源与公有资源的整合以及集体诉求与个人诉求的调和，助推形成乡村社会公序良俗，保证乡村发展长期稳定。

参考文献：

- [1] 夏柱智. 农村集体经济发展与乡村振兴的重点 [J]. 南京农业大学学报 (社科版), 2021 (2): 22—30.
- [2] 张新文, 杜永康. 集体经济引领乡村共同富裕的实践样态、经验透视与创新路径——基于江苏“共同富裕百村实践”的乡村建设经验, [J]. 经济学家, 2022 (6): 88—97.
- [3] 夏晨. 促进新型农村集体经济在地化发展 [N]. 中国社会科学报, 2023—06—14 (06).
- [4] 田世野, 李萍. 新型农村集体经济发展的新规律：一个三维分析框架 [J]. 社会科学研究, 2021 (3): 51—58. [5] 高鸣, 魏佳朔, 宋洪远. 新型农村集体经济创新发展的战略构想与政策优化 [J]. 改革, 2021 (9): 121—133.